

美日等国人民币升值政策述评

查贵勇 温耀庆

摘 要: 近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刮起了一股“人民币升值”的风潮,本文试图针对主要鼓噪者美日等国的贸易逆差进行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出口、中美贸易逆差、中日贸易逆差都与人民币汇率无密切关系,而美日“人民币升值”论是别有用心,其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缓解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非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论; 贸易逆差; 中国出口; 人民币汇率

中图分类号: F 8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05)02-0040-04

一、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出口值关系分析

历经2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飞速发展,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多极经济世界中的一极,并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致使部分经济学家将其视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经常项目余额的积累(近来几个月出口平均增速达35%),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激增和外逃资本的回流,使得中国外汇储备雄踞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而面临严重国内经济问题的日、美等国,强烈要求中国重新评估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因为其深信,低估的人民币促进中国的出口,而相应抑制进口,导致其巨大贸易逆差。

笔者认为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外贸出口的关系必须作全面分析,因为中国出口的增长仅有部分原因归功于人民币汇率政策——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和出口增长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不变,而出口却出现起伏不定的波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得汇率基本固定在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的水平。因此,随着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的浮动,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发生相应浮动。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人民币钉住汇率制度对中国的出口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得美、日等国将其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归咎于中国的现行汇率制度。但事实如何?自2001年以来,美元对欧元处于升值状态,即人民币亦相对于欧元升值,但中国对欧洲出口却处于增长状态,此与传统汇率调节进出口理论相背驰,亦证明中国出口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和人民币币值的评估没有必然联系。

虽然中国对美、日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的出口与其进口是相适应的,即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则存在巨额逆差,并不存在巨额的经常项目剩余,比如2002年中美双边贸易顺差为1 030亿美元,但同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存在730亿美元的逆差。因此2002年中国贸易顺差仅为300亿美元左右,不足GDP的3%,且该数据近年来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如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台湾地区贸易逆差为315亿美元、与韩国为131亿美元。其中台湾地区对大陆的出口已超过大陆GDP的13%;而中国也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韩国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进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贸易赤字具有重大的影响,我国是否也应该仿照美国,以此为藉口迫使台元和韩元升值呢?同样美国以贸易赤字和中国对其出口增长为由而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否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呢?回答均是否定的。

二、对美国关于人民币升值论的评述

虽然中国对美出口近年来连续保持20%~25%的增速,但不可忽视,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和其总进口额的11%左右,由此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失业率上升、贸易赤字扩大等)可谓极其微弱。此外,中美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亦较低,如2002年美国4 68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中,美洲其他国家(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等)占据1 050亿美元,西欧约890亿美元,日本约700亿美元,中国为1 030亿美元,比重仅为22.01%,可见人民币汇率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是微乎其微。因此造成巨额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是另有原因,如国内投资和储蓄的巨额差异。根据预测,若该差异能够通过提高储蓄而缩小,则整体贸易赤字和中美双边贸易赤字亦将会缩小。因为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CA是指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净金融资产头寸的变化,且其值等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差额,即 $CA=S-I$ 。因此,当国内投资I大于国内储蓄S时,该国经常项目将会恶化;反之亦然。

美国在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的同时,却对其不合时宜的出口管制政策继续加强控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多项涉及出口管制,给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后果,中美贸易平衡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美国逐步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同时,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政府相继取消歧视性政策,并向中国提供资本品和技术类进口的政府间金融支持,从而促进了其对中国的出口,提高了其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因此,欧盟国家对中国贸易不仅没有逆差,每年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即在不存在出口垄断的情形下,自动出口限制对实施国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使其国家整体福利趋于恶化,中美贸易逆差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实施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在限制高技术流向中国的同时,对美国国内厂商也带来了巨大损失。2002年,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国别地区排名中,美国已由过去的第一位下降到第四位,列在日本、东盟、中国台湾之后,占中国高技术进口比重为13.4%。美国日益趋强的出口管制政策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

除上述因素之外,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还受下列诸多因素的影响:

1. 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增长越高,进口需求就越旺盛;增长率越低,进口需求就越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在高度繁荣的水平上运行,其GDP年增长率高出日本两个百分点,高出欧盟一个多百分点。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导致其进口需求持续增加,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缓慢增长使得美国的出口增长相对缓慢。

2. 外资涌入 外资的进入影响美元资产价格,影响美国的储蓄与投资,影响其利息

支付;如果外资大量涌入美国,美元资产价格必然上涨,国民储蓄进一步下降,投资进一步上升,并带来每年高额的利息支付,从而进一步恶化贸易收支状况。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20年中吸收了大量的FDI,一直处于引进外资的首位,从而导致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

3.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美国的产业发展水平无疑是全球领先,其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和国内传统制造业的外迁,使得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远快于日本和欧盟。美国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其服务贸易顺差连年攀升,但由于对高新技术出口的种种限制使得其通过服务贸易减少贸易逆差的功能有所弱化,而传统制造业的外迁或退出又加剧了其商品贸易逆差步伐。

总之,正如卞亚军(2003)实证分析证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因素、实际汇率水平、财政赤字、经济增长是美国长期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而不能将其片面地归咎于中国实施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政策。

三、对日本关于人民币升值论的评述

首先,正如日本经济研究所的吴春华研究员指出的:从中国的进口仅约占日本GDP的1%,因此将日本的通货紧缩归咎于人民币低估是毫无道理的,纯属无稽之谈,其中更为不可忽视的是,日本也存在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位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量。此外,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压力正如同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所面临的形势相似,因此日本更应该清楚现阶段迫使人民币升值对其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而言是作用甚微,正如当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并没有提高美国部分产业的竞争力,相反却使其在保护主义的温床上逐渐萎缩、淘汰出局。因此,日本当务之急是将其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而不是想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而对其加以保护,此亦符合跨国投资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其所依赖的核心竞争力也随之发生转移,从而其主要制造国和出口国也随之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再转向落后国家。

其次,日本以广场协议为由迫使人民币升值,因为其认为中国现在正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70年代,具有了与当初日元升值相同的经济、产业基础。但事实究竟如何,现在中国与日、美等国差别究竟是否与广场协议签订时的美、日差别相一致呢?下面,笔者将对此加以比较、说明和论证,以说明中国并不具备该条件。

经过战后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至1968年日本成为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并且在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明显扩大的情况下,主要的工业生产力和大企业的经营规模都迅速扩大,众多产业部门的产量都已位居世界前列,诸多大企业在其经营规模、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率等方面都已接近美国水平。此外,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其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已由原先以出口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一跃而转变为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和机械产品为主,即日本逐步完善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生产率得到逐步提升,特别是机械产业的生产率上升幅度最大,从而造成其价格下降;又因为机械产业是日本的重要出口产业,所以价格的下降成为日元升值的推动力:日本和美国只要没有发生偏离于劳动生产率升幅的物价上涨,那汇率就反映了两国各类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差距的平均值。因此,日本的劳动生产率高,日元必须向与此相适应的

升值方向运动。而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相对美国来说,其上升幅度巨大,超过了美国同期,所以日元升值必不可免。

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发展,经济量虽已跻身世界前列,但经济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如经济结构仍然属于发展中经济类型。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已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但将2000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和1975年日本出口结构相比较可知:2000年中国制成品出口虽占出口总量的89.8%,但纺织品等轻工业品占17.1%,其他杂项(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占34.6%,真正能称为工业品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仅占33.1%,而1975年日本重化学工业品的比重则达83.4%。由此可知,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还未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级化。如汽车产业,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仅仅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中国汽车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2002年中国出口轿车仅1000辆,在世界汽车贸易中中国几乎是单纯的买方。

此外,中国经济虽获得长足发展,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未明显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近20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没有出现明显提高,而日本制造业各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则在1973~1983年间远远超过美国,获得相当显著的提升,使得日本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

日本通过广场协议升值日元是建立在产业和贸易结构高度化以及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基础之上的。而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根本没有达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因此日本要求形成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新“广场协议”实在没有任何道理。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将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钢铁、汽车和石油石化等战略性产业。

总之,与其说“人民币该升值”是在考虑对日本经济的实际效果后而提出的,不如将其理解为是日本在经济政策走投无路下的产物。在经历长达10年的萧条后,日本经济仍丝毫不见复苏迹象,且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税收减少,使财政赤字规模迅速膨胀。在经济深陷“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尽管零利率政策实施了数年之久,仍不见金融政策奏效。时至今日,美国经济不振引发美元贬值,再次加剧人们对日元升值的担心。因此,针对稳健的中国经济,鼓吹人民币升值论,其结果是避开国内问题,转移视线,具有混淆问题本质的危险性。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 [1] 陈文敬.中国面对的贸易壁垒[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
- [2] 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